

# 论《西厢记》中红娘的女性主体意识与形象意义

赫亚琼

西南民族大学, 四川 成都 610225

**摘要:**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红娘的形象意义, 历来被视为“撮合者”的典型范式, 但本研究发现, 其意义价值远不止于促成崔莺莺张生姻缘的功能性作用。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, 聚焦红娘作为崔莺莺与张生情感联结的中介, 其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主动谋划和策略实践。同时, 本文立足元代女性生存的时代困境, 以红娘的中介行为为核心, 通过解析她的行为举止, 揭示红娘形象所蕴含的作者思想、女性主体意识与礼教解构意义, 进而窥见元代社会转型中, 作者对底层女性重构的可能性的思考, 为理解元代女性力量的觉醒与突围提供独特的文本视角。

**关键词:**《西厢记》; 红娘; 形象意义; 女性主体性; 礼教解构

DOI: 10.64649/yh.shfzykjcx.issn3078-8994.202604016

## 0 引言

王实甫(1260年-1336年), 名德信, 大都人, 祖籍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。元代著名戏曲作家, 杂剧《西厢记》的作者, 与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齐名, 合称“元曲四大家”。在宏远博大的历史文明积淀下, “三从四德”等伦理观念深深渗透进元代人民的社会生活, 女性被置于严密的桎梏之中, 其言行举止受到等级秩序与性别规范的双重约束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, 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塑造了受后人称赞的红娘形象, 该形象超越了一个简单的文学角色, 进而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, “红娘”一词本身也就成了促成美好姻缘的“桥梁”代称。红娘既非传统礼教中的“贤良丫鬟”, 也非颠覆秩序的激进者, 她以独特的“桥梁”身份, 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开辟了一条反封建权威的突围之路。

《西厢记》中红娘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, 她以丫鬟的底层身份、女性的边缘立场, 通过一系列主动、智慧的实践, 打破了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的婚姻制度, 消解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伦理禁忌, 更挑战了“主仆有别”的等级秩序。红娘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层面的“成人之美”, 更折射出了元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与对礼教权威的隐性解构。

## 1 主动谋划与主体性彰显

(一) 红娘的主动谋划行为并非一贯的积极主动, 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动遵从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过程。起初, 她以“看守”小姐的婢女身份来到崔莺莺身旁, 对张生的求助抱有戒心甚至讥讽, 认为“秀才们从来懦”。后来, 她因为对正义性和对人物感情的深度认同而产生

了转变, 尤其是崔夫人的“悔婚”事件<sup>[1]</sup>, 让她认清了封建家长权威的“失信”本质。于是, 她参与到了崔张的“爱情保卫战”中, 因此, 崔莺莺与张生爱情的美好结局离不开红娘的鼎力相助<sup>[2]</sup>。同时, 她不畏惧封建大家庭的权威, 勇敢谴责老夫人背信弃义、忘恩悔婚的不道德行为, 着力劝诫老夫人, 若把张生告到官府, 势必落得“治家不严”的罪名, 不仅辱没了“相国家谱”, 还让自己出丑<sup>[3]</sup>。总之, 她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, 更是情感的推动者和行为的策划者, 她的行动体现了她高超的局势掌控能力与主动的创造精神。

(二) 红娘虽为崔莺莺的侍女, 却有她自己的思想和趣味, 具有自我意识。书中红娘曾调侃崔莺莺出嫁时别忘了要“拖带红娘咱”, 这不仅是因为她和莺莺相伴多年, 不忍离开, 也是红娘在为自己的将来考虑, 是有所考虑的<sup>[4]</sup>。这体现了红娘形象中有别于其他传统的丫鬟形象的一点, 即: 并非单一、扁平地作为工具人为主人服务。除了这些, 她还洞察秋毫, 对崔莺莺的心口不一了如指掌:

“(旦怒叫) 红娘! (红做意云) 呀, 决撒了也! 厌的早挖皱了黛眉。(旦云) 小贱人, 不来怎么! (红唱) 忽的波低垂了粉颈, 氲的呵改变了朱颜。(旦云) 小贱人, 这东西那里将来的? 我是相国的小姐, 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...”<sup>[5]</sup>

在这一折中, 她巧妙地利用了莺莺的矜持和内心的渴望, 所以当莺莺责备红娘传书时, 红娘直言: “姐姐休闹……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。”从表面上看, 这是威胁,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表态。她以自首为威胁, 实际上是在迫使莺莺直面自己的情感, 同时也表明自己愿意为崔张的爱情承担风

险。除此之外，最令人震撼的是，当老夫人要责罚崔莺莺时，她挺身而出，声称，“此事皆因妾而起，与小姐无干”，她将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这种担当完全超越了一个丫鬟的本分，她的担当、智趣，赋予了她真正的超越封建时代的女性主体意识。

## 2 崔张爱情的启蒙者

(一) 红娘点破了崔莺莺朦胧的情愫，为后文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。崔张初遇于普救寺佛殿，二人虽都心生爱慕，却因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礼教规范，只能暗藏心意。而此时红娘用直白的调侃和试探，将朦胧的情愫挑破，打破了崔张彼此的心理桎梏。比如，在第一本第三折“张君瑞闹道场”中，当红娘察觉到莺莺对张生的关注时，她进一步主动“搭桥”，声称：“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……敢医可了病恹恹。”直接点出了崔莺莺的“春恨”源于情感的空缺，这既让崔莺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心境，也为后续情感发展埋下伏笔。

(二) 红娘拆解礼教的伪装，帮助崔张二人确认情感。第三本第二折的“张君瑞害相思”中，张生托红娘传递诗笺，莺莺见笺后“拆了又看，看了又拆”，故作怒态斥责红娘：“小贱人，这东西那里将来的？我是相国的小姐，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！”面对这种典型的礼教式伪装，红娘并未畏惧而顺从，而是以“激将法”先将责任巧妙推回莺莺，随后又直言自己要拿着信去老夫人那自首，这看似是威胁，实则是借此帮助崔莺莺承认自己对张生的情意。

(三) 红娘的爱情启蒙最终落实在鼓励二人突破行动禁忌，为爱情争取合法性。第三本第三折的“隔墙花影动”中，红娘为崔张两人安排月下相会，而莺莺仍因“怕夫人嗔责”而犹豫不前，红娘直接以“事已至此，不如从实招了”为其分析情况的利弊，减轻其恐惧。在下文，当崔张相会之事被老夫人知晓并要严惩两人时，红娘更是对此“据理力争”，既迫使老夫人承认崔张姻缘的合法性，又让崔莺莺明白：他们的爱情并非“苟合”，也非伤风败俗，而是基于“诚信”与“真爱”，是值得为之抗争的，以此完成对二人爱情的终极启蒙。

## 3 象征元代礼教的解构

(一) 红娘以下位者的身份挑战了上位者的权威。作为相府的底层丫鬟，红娘从未因身份卑微而被动顺从。这在上文已多次提及，如：“威胁”崔莺莺自己要“自首”，以及勇敢地反抗老夫人的权威等都体现了这一点。红娘地位低贱，崔莺莺也曾唤她“小贱人”，而她不

惧怕身份的悬殊，有自己独立的判断，举止大方得体，可见其身上象征着元代等级秩序的松动：底层群体不再被动接受礼教的束缚，而是用自身的智慧争夺平等的话语权。红娘面对老夫人的“礼教审判”，并未直接否定礼教本身，而是巧妙地引用儒家礼教的核心价值进行反击。她引用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的儒家经典，指出老夫人“失信”的行为对礼教道德的违背，她将老夫人置于“失德”的境地，机智地让礼教成为捍卫爱情的武器而非压迫工具。

(二) 红娘以“女性中介”的身份，冲击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封建大关。她的“桥梁”身份，既帮助了小姐反抗封建礼教，也在张生追求真挚爱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红娘形象的塑造，既体现了作者对女性智慧的赞美，也展现了女性在爱情追求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<sup>[6]</sup>。第三本第一折中，红娘主动为张生献上计谋：“但听咳嗽为令，先生动操”，让张生以琴声传递情意。这种行为并非简单意义上的“撮合”，而是作者对“女性不得主动参与异性社交”的性别规范的公然挑战，这证明女性并非只能被动等待“媒妁之言”，而是可以成为爱情的主动建构者。

## 4 作者思想的寄托

(一) 红娘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下层小人物追求幸福生活的认可<sup>[7]</sup>。红娘，她身处的元代还保留着“媵妾”流变后的制度，即崔莺莺嫁人的时候，她作为崔莺莺的贴身侍女，可能需要一并嫁出去。她知晓自己的处境，在琢磨透张生的品行以及他对崔莺莺真挚的爱后，红娘不再置身事外，而是大胆撮合<sup>[8]</sup>。在第一本的第三折“联吟”中，红娘将崔莺莺的心愿清楚无误地表露出来后，也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：“姐姐不祝这一炷香，我替姐姐祝告：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，拖带红娘咱。”这体现了红娘既希望崔莺莺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希望自己日后能有个好去处<sup>[9]</sup>。

(二) 作者借红娘这一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强调了婚姻爱情的自主，猛烈冲击了封建伦理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”的传统婚姻习俗<sup>[10]</sup>。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无视崔张“相府小姐”与“白衣书生”的巨大门第差异，也不顾老夫人“三辈不招白衣女婿”的家族规矩，始终坚信两人真心相爱，并以此为自己的行动准则：主动为崔张两人搭建沟通的桥梁；为两人制造见面的机会；不惜冒着被责罚的风险为两人掩护。这本质上是作者在传递一个核心思想：婚姻应源于男女双方的真挚情感，这一思想在故事结局的重构方面最为明显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

结局从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演变为了才子佳人团圆式——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喜剧<sup>[11]</sup>，这一演变的关键因素聚焦于作者本身对男女爱情“自主性”的推崇。

(三)《西厢记》暗含了作者人人平等的意识，尤其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肯定。红娘的女仆形象，无论是对主人的呵护与帮助，还是对自己的定位和认知，都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理解与诠释<sup>[12]</sup>。作者通过红娘形象，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“被动、依附”的刻板印象，表达出了对女性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的尊重。红娘主动判断崔张情感的真挚性与合理性，自主决定是否出手相助，在面对危机时，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，沉着应对、据理力争。她在戏剧中的行动完全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，而非被动地服从于任何权威。同时，作者还借红娘、莺莺之间的互动，展现了“女性互助”的珍贵价值。这背后是作者对女性群体共同反抗压迫的肯定，表达了女性不应该相互疏离、争夺男性资源，而应该彼此支撑、共同突围的思想。这种思想，超越了历史时代的限制，对今天仍有启示作用。

## 5 结语

本文通过解析文本发现，红娘的中介行为绝非被动的功能性行动，而是充满主体性的策

略实践。她主动搭建了崔张情感联结的桥梁，并以其敏锐的洞察与巧妙的引导启蒙了两人的情感自觉。当她面对封建家长的权威压迫时，据理力争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与封建权威争夺礼教的解释权。红娘身上超越丫鬟身份的担当与果敢，打破了传统的“主尊仆卑”的等级桎梏与女性“被动从属”的性别刻板印象。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多维解构，彰显了底层女性在礼教夹缝中主动作为的可能性。

从更深层的角度进行理解，红娘的形象暗含着王实甫对元代社会转型的深刻思考。作者通过红娘的言行举止，探讨了底层女性参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路径与价值。她并非以激进的方式颠覆传统礼教，而是以民间小人物的智慧在规则内部寻求突破，这种方式，既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，也彰显了人性追求解放的必然趋势。

综上所述，红娘女性形象的意义远超它本身的文学典型。她不仅是元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象征，更是后世理解传统社会女性生存智慧与抗争精神的重要范本。红娘身上闪耀的主动精神、策略智慧与正义担当，印证了作者的思想：女性力量不应该以互相对抗的形式存在，而应该以互帮互助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伦理中。这一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内核，至今仍为探讨女性价值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刘清. 浅析《西厢记》中的红娘形象[J]. 名作欣赏, 2022, (11): 110-112.
- [2] 任文肖, 李欣童, 许婷婷. 《西厢记》中“红娘”的秘书职业能力分析[J]. 传播力研究, 2019, 3(08): 131-132.
- [3] 马明喆. 论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的红娘形象[J]. 传播力研究, 2019, 3(04): 136-137.
- [4] 朱俊海. 未必没有私心——《西厢记》红娘形象新论[J]. 梧州学院学报, 2007, (01): 88-90.
- [5] 朱东润.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<崔莺莺待月西厢记>下编第一册[M].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21.1.
- [6] 李素平. 《苏六娘》之桃花与《西厢记》之红娘形象比较[J]. 戏剧之家, 2025, (03): 11-13.
- [7] 庄清华. 《西厢记》中红娘的角色功能[J]. 三明学院学报, 2015, 32(01): 63-67.
- [8] 姜一臣. 浅析《西厢记》的主要人物形象[J]. 汉字文化, 2021, (23): 79-80.
- [9] 张蔚琼. 《西厢记》红娘“心解”[J]. 沧桑, 2011, (01): 247-248.
- [10] 张瑞. 从《莺莺传》到《西厢记》中的红娘形象分析[J]. 今古文创, 2024, (43): 19-23.
- [11] 张露露, 徐梅. 论西厢故事演变中的女性意识[J].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, 2023, 31(04): 88-96.
- [12] 甄蕾. 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与《伪君子》女仆形象之比较[J]. 明清小说研究, 2024, (03): 147-160.

**作者简介：**赫亚琼(2005—)，女，彝族，四川凉山会理人，本科在读，研究方向：汉语言文学。